

中关村,中国改革开放的创新样本

演讲 宁肯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不久前,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2019书香·上海之夏名家新作讲坛”中,《北京:城与年》《中关村笔记》的作者宁肯讲述了北京中关村的故事。他说,中关村是改革开放的创新样本,中关村的文化是各地不同的文化融入北京文化,并最终汇聚成了改革开放的洪流。

话外音



“中国发展这么快,我没有想到,恐怕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想得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每年我至少去中国一次,发现中国人生活得越来越好了。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政府将人才培养放在了重要位置。1977年以后考进大学的那一批人有新的思想,非常了不起,他们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作家。我讨厌叛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可以被看作是托尔斯泰的后代。可惜现在的戏剧丢失了最原初的作用,很多戏剧家都去做电影了。而对我来说,戏剧就是语言和剧场,不要任何器材,就是用语言来打动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到现在运营里程达到13.1万公里,中国铁路已经建成了当今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而且,在2016年9月,我们中国高铁的标准被纳入了世界通用标准,也就是说,从中国标准变成了世界标准。”



“很多大企业都出自小地方。这是因为这些企业所在的地方小,企业反而主动往外走,心中装有‘世界地图’,企业从一开始就相信好东西是给全人类造的,而全球化的过程正是企业提升品质的一条现成路径。所以,中国企业家的‘心’要非常大,要把全球消费者装在心中。”



“技术可以升级人类,也会‘降级’人类。一部好的科幻小说,其实不是以科技为核心去写的,它是围绕着科技可能给人类带来的人性、社会、伦理道德的种种冲击,以及人类在这个洪流中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去展开的,这个永恒的话题对于我们当下才是有意义的。”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北京如果没有中关村,它也许就是一座地域化的城市,因为中关村的文化代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北京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力量。在中关村创业初期,那些创业者之所以能新的环境中扎根并顽强发展起来,原因是一样的:他们身上爆发出来一种将文化力量和人格力量融为一体精神。

“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

我不能想象,北京如果没有中关村会是什么样。北京如果没有中关村,它也许就是一座地域化的城市,因为中关村的文化代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北京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力量。我们来说说中关村的来龙去脉。有人把中关村称作“中国的硅谷”。就像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是从安徽小岗村开始的,中关村也是一样,它是改革开放的创新样本。我讲的第一个故事是陈春先的故事。陈春先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1978年,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代表团成员一共4个人,其中就有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核聚变专家陈春先。访问美国期间,给陈春先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实验室,不是高楼大厦,不是满街的汽车,而是美国科技研发的巨大能量。陈春先注意到,托卡马克是一种利用磁约束来实现受控核聚变的装置,这原来是由苏联科学家研制成功的,但美国科学家只用了几个月时间研究托卡马克,很快就超过了苏联。后来美国不但发射了卫星,还把宇航员送上了月球。不久,陈春先有了第二次访美的机会,这次他以个人身份走访了十几个核聚变实验室。同样让陈春先感到惊讶的是,那些先进的实验设备竟然都是一些很小的公司制造出来的,这些公司多不过百人,少的只有几十人。陈春先问美国的朋友:这些公司怎么可能成为国家核试验设备的供应商?朋友告诉陈

春先,这些小公司都是美国新技术扩散区的新技术公司,新技术扩散区在波士顿128公路、旧金山硅谷两地,那里有着几千家新技术公司,这些公司都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大学教授、工程师、大学生,他们有技术,负责产品设计、研发、制造和销售;另一部分是风险投资家、企业家,是金融界人士,他们负责提供公司创业时期所需要的资金。朋友的这番话,让陈春先感到非常新鲜。教授、大学生竟然可以办公司,陈春先觉得,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实在是差别太大了。在波士顿128公路,陈春先来到了朋友所在的永磁公司。永磁公司的老板汤姆克是一位荷兰籍的美国人,也是波士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与陈春先是同行。但不同的是,汤姆克教授同时开着一家公司,为美国航天局供货。永磁公司只有20多个员工,生意多的时候招一些临时工。汤姆克告诉陈春先:我有技术,有想法,其他一些人有钱,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产品。陈春先问:就这么简单?汤姆克说,就这么简单。陈春先到硅谷转了一圈之后,这位核聚变物理学家的头脑里也发生了“核聚变”。回到北京,陈春先眼中的中关村已经完全不同了:既然中关村也有那么多大学和研究所,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密度不亚于硅谷,不亚于128公路,那么它们为什么不学美国人那样做呢?于是,陈春先给物理所打了一份申办公司的报告。然而,那是在1979年,个人办公

“只赚5元钱”的创业故事

此后,一大批中科院、北大、清华的分子纷纷“下海”创业。京海、四通、四通、科海、联想等民营科技公司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陆续在北起燕园、南到白石桥这条几公里长的大街上安营扎寨。1985年,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上世纪90年代,中关村有几个非常有名的电子市场,主要经营电脑配件。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四海市场,市场几层楼上上下下有几百家店面。那时候,品牌电脑很贵,大家就买配件自己组装,所以电脑配件生意非常红火。但是,要想在这里做生意,需要租一个柜台,有一个年轻人连这点本钱也没有,于是他就给这些柜台供货,建立自己的客户群。那时候,一个机箱的利润在15-30元,由于机箱沉,不易搬运,许多店铺不愿做这个生意,这正好给这个年轻人留下了机会。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一手拿着机箱,一手握着车把,车后还挂着好多个键盘,七扭八歪地在路上送货。

除了成本,每个机箱别人能赚10元、20元,他坚持只赚5元钱。他的口头禅是:“我就赚你5元钱,包退包换。”后来,“只赚5元钱”,成了他的信誉和名声。你别小看这句话,“只赚5元钱”,这不仅是生意经,更包含了人性的准则。什么准则?诚实、信任,它打破了买卖之间的界限,建立起了透明的关系,达成了人性原则和商业原则合为一体的契约精神。他的生意越来越有起色,改骑三轮车送货了。三轮车比自行车拉货拉得多,但也有麻烦。三轮车一次可以装4箱键盘和4个机箱,但是他只有两只手,一次只能搬两箱上楼,怎么办?他的办法很原始,就像蚂蚁搬家一样,先拿两个机箱进去,在自己的可视范围内把东西放下,再回过头去搬其他货物,就这样一次次地搬运,终于把所有货物都送到指定地点。当时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和他一样给柜台送货的,大部分是来自安徽、河南的农民。但这个年轻人不是普通人,他是清华

“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的奇迹

中关村还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比如出生于上海的王选,被称为“中国当代毕昇”。原先,报纸、印刷品都是通过铅字排版印刷,费时费力,而王选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实现了我国出版印刷行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照排这个项目,第一代是上世纪40年代美国发明的手动照排机;第二代是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光学机械式照排机;第三代是运用数字存储技术,当时在美国很流行;第四代则是用激光扫描的方法,但是1975年的时候还处在研制阶段。当时,中国出版业的现状仍是铅字排版和印刷。为改变落后状况,1974年,我国设立“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当时共有5个攻关班子从事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研究,其中包括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北京印刷厂、中华印刷厂、上海印刷厂,每个机构都由强大的专家团队组成,进行研究和攻关。1975年的一天,5家机构提交了各自的方案。然而,突然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就是王选,

当时他只是北京大学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助教,他以个人名义也提交了方案。历史就是这样有意思,总有人单枪匹马,就像陈春先一样,挑战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当时的5个攻关班子中,有2个选择了二代机,3个采用了三代机。在汉字信息的存储方面,这5个采用的全部是模拟存储方式。但在经过大量的资料研究后,王选大胆提出:跨过当时流行的二代机和三代机,直接研制世界上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几经曲折,王选的技术方案得以报批,王选和同事们开始了研制原理性样机的攻坚战。为了攻克汉字字形信息的计算机存储和复原输出的世界性难题,王选从一个科技人员变成了一位文字专家,他从科技的角度去研究中国文字的各种规律,他甚至比所有的文字专家研究得更加透彻。最终,历经艰难,1979年,我国首个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研制成功。紧接着,王选努力将成果转化为商品,和产业相结合。他与多个协作单位联合攻关,紧跟市场需求,先后研制出8代汉字激光照排产品,使中国的传

司是闻所未闻的事,在当时简直像是说梦话,不出所料,他的报告石沉大海。陈春先又找到北京市科协,于1980年12月,与物理所的10多位学术骨干一起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那时候不敢叫公司,只能叫服务部、服务中心,实际上就是公司,就是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公司。为了这家民营科技公司,陈春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被认为是经济问题,大会上被点名批评,说服务部是“科技二道贩子”,服务部的津贴是鼓励科技人员不务正业。于是,很多人都后悔到服务部兼职,后悔跟着陈春先一起干,还有人把得到的津贴、奖金塞在一个信封里,悄悄还给了陈春先。陈春先被立案审查,服务部也被查封查账,面临解体。然而,转机突然出现了。1983年1月25日清晨,纪世瀛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惊醒。纪世瀛是和陈春先一起创办服务部的骨干,他所住的中关村88号楼里,还住着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著名科学家。这天清晨,有人在门外喊他赶快打开收音机听北京新闻,纪世瀛打开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有关他们服务部的报道,中央肯定了服务部的做法,认为陈春先带头开创了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大家很快跑到服务部,相互抱在一起,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有人说,陈春先的一小步,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步。我觉得恰如其辞。陈春先是四川成都人,先后在四川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学习,后来到北京中科院物理所工作。他是一个外来移民,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关村的文化是北京的外来文化。我认为,一座城市要不断注入外来的东西,不断注入新的东西,这座城市才会变得越来越现代、越来越立体,而中关村正是这样给北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大学建筑系的高才生,他完全放下了大学的身段,真正像个农民一样参与竞争。最终,他凭借着渊博的知识、“只赚5元钱”的信条,以及蚂蚁搬家式的吃苦耐劳,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在我看来,他这棵树的根扎得这么深,能不长成参天大树吗?他卖的键盘后来贴上了自己的标签,叫“小太阳”。在当时,小太阳键盘每个月的销量达到3万台,占全国市场70%的份额。他是中关村第一个将彩显、机箱、键盘都统一贴上“小太阳”标签的人。后来,“小太阳”又改名为“爱国者”。说到这里很多人已经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爱国者集团总裁冯军。2008年9月25日,中国的神舟七号发射成功,神舟七号舱内记录并存储着大量信息,存储装置就是由冯军的“爱国者”提供的。2006年,冯军获得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创新奖”,与柳传志、马云、王健林一同创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2007年,冯军参加达沃斯论坛,成为“世界青年领袖”。这棵树已经长得如此枝繁叶茂。来自陕西西安的冯军,身上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奋斗精神,这种深厚的民族性格也是中关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统出版印刷行业得到了彻底改造,成为用自主创新技术改变传统行业的典范。此后,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又走出国门,不仅占领了华文报业市场,还出口到发达国家。而从1975年到1993年,为了抓紧时间不断攻关和创新,王选连一个完整的节假日也没有休息过。王选生前十分推崇这样一句话:“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必然会丢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选的身体状况一直非常糟糕。早些年在北京工作时,他就患上了一种不知名的疾病,生活无法自理,无奈之下只能回上海养病。后来回到北京,仍然一直病病恹恹,看了所有的医院,医生都表示治不好他的病,从身体角度来说他完全就是一个病夫。他在宣读自己的方案时,都没有力气读完,只能让他的妻子陈望莹代他宣读方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总而言之,在中关村创业初期,那些创业者之所以能新的环境中扎根并顽强发展起来,原因是一样的:他们身上爆发出来一种将文化力量和人格力量融为一体精神。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中关村是改革开放的创新样本,中关村的文化是各地不同的文化融入北京文化,并最终汇聚成了改革开放的洪流。

听讲座

什么样的城市才算移民城市

葛剑雄

不久前,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来到成都寻麓书馆,做了题为“移民与城市文化:上海与成都的比较”的讲座。在讲座中,葛剑雄教授解析了什么是移民城市以及移民对于城市文化的塑造。

什么是移民?移民是指往他地迁移的居民,但这种迁移是以定居为目的的。外地人来到成都读书算不算移民?不算,因为他有可能毕业后就回家乡了。但是如果他毕业后在成都定居,即使没有户口,也可以算移民。总而言之,移民是以定居或者以争取定居为目的的流动人口。移民和普通的流动人口,对待当地文化的态度是不同的,对于城市的归属感也是不同的。比如当地方言,流动人口一般是不考虑去学的,听不懂叫人翻译一下就行;但是,想长期定居的人,不仅希望听得懂当地方言,还会积极去学习。移民对当地文化有一种归属感,他们不是简单地听之任之,而是积极地参与或接受当地的城市文化,甚至愿意去改变它。

一座城市怎样才算是移民城市呢?当移民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这座城市才叫移民城市。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因为上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1949年),非上海籍人士以及他们的后代占总人口的近80%,这就叫移民城市。一般来说,移民占城市人口的一半以上,才算是一座移民城市。比如深圳前几年户籍人口350万,而非户籍人口近1000万,这就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此外,移民城市不仅仅要看移民的数量,还要看移民的质量。

那些杰出的移民,是指拥有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移民,哪怕他只是一个人,所起的作用也会非常大。比如,成都历史上就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移民——文翁。文翁是今天安徽合肥一带的人,到四川做大守,他地位高,有文化,后来老死在四川。“文翁治蜀”蜀地的文化就是通过他转变的。他做大守期间发现蜀地经济繁荣,但有蛮夷之风,于是他下决心要改变。他的办法就是办学校、兴教育,他创办的文翁学堂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它就是今天成都石室中学的前身。文翁规定,富人必须要送孩子到这里念书,念书之后可以做官,没有在这个学校读过书的人不能当官。当地没有高水平的老师怎么办?他选送十多个聪敏有才华的郡县小吏到长安去留学。地方财政负担不起留学经费,他就想了个主意,每年官员到长安报告户籍档案时,就让他们带上蜀地的土特产、工艺品到长安卖掉,再用这些钱作为留学经费。他的这一系列措施,使蜀地转变了风气,直到现在老百姓还在纪念他。文翁就是一个移民,他起的作用非常大。

我曾经比较过上海和天津的移民情况,上海的移民人口为80%,天津为60%,同属移民城市,但为什么天津近代没有产生像上海这样发达的城市文化?天津的地位也不能和上海相比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上海和天津大多数来自浙江、江苏,特别是浙江北部与江苏南部。五代、北宋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由北方转到南方,苏南是最近1000年来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到了明清时期,浙江、江苏一带状元出得最多。这个地区人口很多,人均土地很少,农民已经走上了精耕细作的道路,商业、服务业也非常发达。这些移民到了上海后如鱼得水,很快就适应了城市生活,并且形成了新的城市文化。

天津的移民则主要来自河北周边一带,还有山东。近代以来,山东、河北经济落后,文化层级也比较低,移民来源和总体素质都无法和上海相比,因此移民造成的社会影响也较小。上海的移民还有多元化的特点,除了江苏、浙江,移民其次多的是广东人,之后是安徽人。上海开放比广州晚,广东因为临近澳门、香港,华侨众多,所以较早引进了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模式,比如新式的大百货店,都是广东人引进上海发展的。还有照相馆、眼镜店等行业,也都是从广东传入上海的。移民把各种文化带到了上海,这些文化互相碰撞和冲击,最后又融合成了新的城市文化。

在近代这么多的移民城市中,上海成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城市,还因为上海有一批特殊的移民——外国人。刚开埠时全上海只有20多个外国人,而上海侨民最多的时候有多少呢?登记在册的就有15万人。一直到1949年,上海的外国人还有2万多人。这些移民中有两部分外国人群,一部分是犹太人,一部分是流亡的俄罗斯贵族、知识精英。犹太人中,有早期到上海定居的,比如沙逊家族,上海首富哈同,也有二战爆发后希特勒驱逐的犹太难民。现在年纪大一点的上海人都记得,小时候在上海的街头上,卖面包的有白俄人,磨剪刀的有犹太人。

还有一些在上海定居的是留学归来的中国人,比如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徐悲鸿,他们也把西方的文化带到了上海。由此,上海就产生了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是各地移民文化的简单融合,而且进一步发展升华了。(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内容有删减)